

城市：中国现代作家的一个独特心结

刘 勇

内容提要：城市，是中国现代文学书写的一个复杂的主题，更是中国现代作家的一个独特心结。从现代都市到传统乡土，从本土经验到域外书写，各种文学形态中都蕴含着现代作家的城市心结。这种心结是作家自身现实体验的结果，同时带有作家十分强烈的主观色彩和情感投射，还有作家域外体验的比较视野，因而呈现出一种多元、复杂的状态。了解这个心结可以从多重侧面更深入地触摸中国现代文学的本质和底蕴。

关键词：现代作家 城市 心结

虽然城市在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并作为作家描写的重要意象反复出现，但是城市文学在中国现代作家笔下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态，很难找出较为趋同固定的描写模式和价值判断。与价值取向较为固定的乡土文学等地域经验相比，城市在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中的呈现往往是复杂的，甚至是比较虚的，对于城市的价值判断常常是不确定的。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中国作家对农村的体验和经验明显大于对城市的体验和经验，不仅如此，许多作家的城市经验都与其对农村的经验有着深刻与密切的关联。中国现代作家几代人描写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等城市，建构了所谓中国都市的想象，但这还不是城市文学最重要的价值体现，比如像老舍、王朔、陈建功等人对北京的描写，张爱玲、王安忆等人对上海的描写，其实他们这种城市的描写并没有什么复杂的情结，是一种单向度的对城市的描写欲望。复杂的是另一种情景，比如沈从文等人，他们笔下写的是湘西，是偏远的乡土农村，但心里依然想着城市，他们的边城叙事里隐喻着对都市的思考，他们的乡土描写中渗透着对城市的想象，这种情愫才是多面向的，更为复杂和更为重要的。城市对于现代作家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城市本身，还和多种不同经验交织在一起，即使在乡村、域外等远离中国城

本文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京味文化的谱系研究》（编号12WYA004）阶段性成果。

市的环境体验里，这些现代作家心里依然装着中国本土的城市，以及对于中国城市自身的判断、建构和想象，这种文学状态与描写城市本身的作品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作家独特而又复杂的城市心结。

这种城市心结在中国现代文学当中的体现，不仅仅是出现在大量以中国现代城市为背景和题材的作品，在现代文学当中占更多数量的乡土文学创作，以及对作家人生和文学道路都具有特殊意义的域外城市体验和书写，其背后也无不反映出中国现代作家对于城市的心结。在这种心结的影响下，从城市到乡村，从域外到本土，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当中存在的各种多元、分离的空间，有了一个较为明确的精神统摄和出发点。正是这个内部的精神出发点，让中国现代作家笔下外在的城市/乡土、域外/乡土空间，被赋予了有关现代/传统、东方/西方、文明/野蛮等一系列问题的多元判断和复杂思考，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更丰富的文学内涵和价值追求。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中国近现代历史当中城市的进化、发展关系密切，西方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对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乡土社会的冲击，造就了近现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古代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步向现代工商业发达的现代社会转变，亦即中国的现代化、城镇化进程。这种转变的影响也深深作用并表现在文学领域：首先中国现代文学外部的文学生产方式，正是受到近现代城市出版文明、印刷工业的影响，一步步由传统的非职业化的旧式文人生活旨趣，向着商业化、职业化写作方向发展；其次文学的创作者和参与者，由乡土社会当中传统的乡绅、士大夫以及文人雅士团体，逐步变为城市市场当中文学期刊杂志的职业作家、现代城市里的学院派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则是文学形式内容本身，由乡土向城市的过渡，山水田园诗的古典文学形态，和以儒释道为主体的文学思想情感表达，正逐步走向衰落，越来越多的现代作家的目光和笔触开始伸向飞速发展中的中国城市，生活在城市当中的人和人的思想，以及这些处于时代当中的城市所蕴含着的中西方文化冲突。

从文学的外部生产方式的过渡，到文学写作者身份的转型，再到文学表现内容的变迁，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城市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就中国现代文学本身而言，城市之于现代作家文学创作最独特的意义，不在于城市所给予的文学生产空间和创作叙述题材，甚至不在于作家对于城市景观、文学、人物的接触体验，而在于中国现代作家对于现代城市的一个独特的心结。

应该看到，城市文学本身不能算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甚至在近现代中国，不同的城市与城市之间也是割裂的，从城市景观设施本身到城市民俗文化差距都十分巨大。除去上海这样受到西方殖民者改造比较透彻的十里洋场，比较接近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在这之外，即使在老舍、周作人等作家的笔下有大量叙述和描写的北京，也不过是中国传统式的田园城市，他们笔下所刻画的人与物，与其说是对中国现代城市的呈现，毋宁说是处于时代剧变浪潮之下中国乡土社会的风情画。传统农耕文明、乡土社会的文化惯性和影响力在中国现代文学阶段并没有消逝，反而影响深远，这种影响甚至超出了现代的城市文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批作家虽然长时间生活在城市，作为现代报刊、新式学院、都市沙龙等城市文学生产空间里的一员，自身也有许多关于城市的创作，但是如果与农村、乡土文学相比较的话，中国现代城市的描写，依然处于相对较少甚至缺失的状态。尽管鲁迅、沈从文这些作家在他们创作的黄金时期都生活在中国如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但是他们更愿意也更擅长描写的还是中国的乡村，在那里来塑造他们的人物、来构建他们小说世界。除去老舍、张爱玲等少数几位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中国现代作家大部分来自农村，他们大都是作为城市的外来客、异乡人存在的，他们感觉更亲切、写起来更游刃有余的还是中国农村、乡土的题材与人物，现代作家惯于把自己的生存境遇、思想情愫与乡土之间的关系、记忆联系起来，用文学的笔墨来表现中国土地、人民的原生态。哪怕是像茅盾这样以写上海洋场、现代都市而著称的作家，也始终不断地在文章和创作里强调自己的乡村经验和泥土气息，他曾经在《乡村杂景》中这样说：

生长在农村，但在都市里长大，并且在都市里饱尝了“人间味”，我自信我染着若干都市人的气质；我每每感到都市人的气质是一个弱点，总想摆脱，却怎地也摆脱不下；然而到了乡村住下，静思默念，我又觉得自己的血液里原来还保留着乡村的“泥土气息”。^①

但是，这些作家笔下的题材和人物是乡村的，并不代表这些创作就与城市没有关系了。恰恰相反，正如一块硬币的两面，在大量农村景观、乡土风情被叙述、呈现的中国现代文学当中，其文学创作背后蕴含的影射和指向往往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处于剧变状态中的城市，这种影射和指向可以是文字描写表层呈现出来的，也可以是文学作品、精神内核中所隐含的，这种从文学表层到精神内核的城市关切和指向，也正是中国现代作家心中挥之不去城市心结的体现。

一方面，正如茅盾这样将城市与农村时常置于同一图景之下进行议论、书写，现代作家笔下大量的乡村描写和“泥土气息”都是与城市互为对照、息息相

关的；另一方面，或者如沈从文那样，有关城市和乡村的小说、散文常常是分离的，可沈从文描写湘西边地，心中每每装着城市。茅盾这样充分融入到现代城市文明当中的作家，虽然也时常提到乡土，但是作为城市的附着而存在，城市是他笔下作品正面描写的主体，他也并不掩饰自己对于城市声光化电、机械文明的赞美；而诸如沈从文那样关于湘西的乡土文学创作，不能称为城市文学的范畴，但又实实在在与城市有关联，这种乡土文学往往是作为反城市或反思城市的话语而存在的——是近现代中国的城市文明催生了中国大批的乡土文学题材写作。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导言当中，借用勃兰克斯有关“侨民文学”的阐释，第一次提出了乡土文学和侨寓文学的概念，针对身在城市却书写乡土的这批作家，他指出：“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家所写的文章。”^②鲁迅在导言中引用乡土文学作家黎锦明在小说集《烈火》序言中的话，可以作为侨居于都市当中的乡土文学作家们对于城市文明态度的一个代表：

在北京生活的人们，如其有灵魂，他们的灵魂恐怕未有不染遍了灰色罢，自然，《烈火》即在这情形中写成，当我去年春时来到上海，我的心境完全变了，对于它，只有遗弃的一念……^③

五四时期乡土小说创作的大量出现，不是中国田园牧歌式古典文学的回光返照，从乡土文学的精神源头来讲，从鲁迅的导言当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现代城市文明的冲击和影响是不可忽略的。有学者就曾经指出：“近代中国城市的发育造成其与乡村的分野，使乡村成为一种可以与城市进行对比的存在，为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农村题材的传统。”^④就如沈从文、废名等人后来的乡土小说一样，他们虽是土生土长的乡下人，但是他们笔下的乡村书写是对于乡村的再发现，是以城市为出发点的。这些乡土小说，在写乡土的时候指涉着都市，写乡下人的时候对比着城里人，写田园牧歌的时候思考着工商业文明，可以说，中国现代乡土作家和作品的全新视野，正是中国现代城市所赋予的。

对于正面描写城市景观、机械工厂的作家而言，由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落后与破败，他们的城市情结源于对中国现代化图景的憧憬与想象；可是中国社会、城市发展的不平衡与病态，往往又导致了大批现代作家对城市文明的失望和颓唐情绪。于是像乡土小说群体一样，站在城市当中回望乡土、书写农村，成了很多现代作家的选择，可笔下虽然写的是乡土，精神的指向往往是城市，这种由近而远、由乡村而城市的写作于是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常态。尽管关于乡土人情、田园牧歌的留恋与赞美不在少数，现代作家基于乡土世界、传统文化对

于城市的现实映射与想象却从未消失，尤其是当王鲁彦、蹇先艾等人笔下乡村封闭、保守、愚昧、野蛮的图景，在与城市现代理念的对比中逐步展开之时，作家心中的现代文明与城市心结往往更加难以解开。而这种对于附着在城市身上的现代文明的向往和焦虑，往往不止于中国本土的现代城市，更多的本源来自于大批作家的域外城市体验。

二

倘若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是中国现代作家城市心结的一个反面，是一种自省的结果的话，那么中国现代作家的异域城市体验，则毫无疑问是中国现代作家城市心结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正面因子。中国现代作家的现代城市体验，有很多是来自于域外特别是欧美发达地区的留学、游历经历，这种迈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体验，让许多来自封闭乡村的中国作家，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和影响。作为最直接的感官接触，欧美世界乃至近代日本城市的发达和飞速发展，一定会给这些作家留以有关现代城市文明的最深刻印象，提供给他们对于民族国家、城市现代化远景的展望，并为他们之后有关城市创作提供书写、想象的基础。这其中不仅仅是西方物质文明的发达，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同样让这些初出国门的现代作家触动很大，甚至影响了他们一生的创作风格。闻一多早年在芝加哥留学时，于寄给梁实秋等友人的书信中谈及他在美国的各种见闻，言语中不难看出他当时身处这座美国大都市时的兴奋与骄傲之情：

芝加哥乃美国第二大城市。我只讲一件事，你们就知道这里工厂之多，米西根街一带房屋皆有黑色，工厂吐出之煤烟熏之使然也。我们在那里去一回，领子就变黑了。这里对我最 imposing 的两个地方是美术学院里的美术馆同芝加哥电影园。美术馆之壮丽辉煌，你们自然能够臆想得到。戏园绝非在清华看看 Fairbanks、Mary Pickford 或 Pearl White 的人所能梦见的。^⑤

中国近现代的落后，使得西方工业机械文明在作家眼里自然是一种先进的表现，在王韬、梁启超、黄遵宪等一大批晚清知识分子出访、游历欧美的记述中，就有许多有关西方城市物质文明的介绍在里面。而在后来茅盾有关上海城市里工程、器械的描写中，也可以看出中国现代作家从国家富强的角度出发，对于现代城市工业文明的集体向往。但是和晚清中国的一些作家、知识分子不同，闻一多在美国城市中体验到的不仅仅是物质文明的发达，还有文化环境的优越，他在信中反思：“讲到这里令我起疑问了，何以机械与艺术两个绝不相容的东西能够同时发达到这种地步呢？我们东方人这几千年来机械没有弄好，艺术也没有弄好，

我们的精力到底花到那里去了呢？”^⑥

这种异域的城市环境里，从物质条件到文化环境的亲身感受和体验，势必会带来一种文化落差之下所形成的焦虑和反思。与写乡村一样，关于外国的城市体验，在现代作家笔下依然是指向中国自己的城市文明。在设身处地接触西方城市文明之后，反观中国自身的国民性和城市文化。梁启超、黄遵宪等人于晚清时期访问北美之时，一方面曾经为西方世界发达的物质文明、雄伟的城市景观所惊叹，另一方面也对于在西方城市环境中华人社会所表现出的恶俗、愚昧、丑陋的国民性有深刻批判。身处美国现代最发达城市之中的闻一多同样也不例外，尽管他身边接触的华人大都是清华等院校所派留洋的高材生，但是闻一多的见闻和之前晚清文人、知识分子一样，同样是华人之间帮派林立、四分五裂与互相争斗，学生颓唐萎靡，大多数人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老舍在《二马》中甚至描写到了伦敦这样的现代城市里西方人对于华人的态度：

在伦敦的中国人，大概可以分作两等，工人和学生。工人多半是住在东伦敦，最给中国人丢脸的中国城。没钱到东方旅行的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到伦敦的时候，总要到中国城去看一眼，为是找些小说，日记，新闻的材料。^⑦

这大概可以看成是中国现代作家对于西方现代城市体验的两极：一方面他们在艳羨于西方城市物质文明乃至文化环境的优越与发达；另一方面在此对比之下他们所见到的中国物质文明的落后以及国民劣根性，又让他们感到极度焦虑与羞愧，这一点在郁达夫等人的旅日小说中也有充分体现。这种两极的体验让他们回过头来反观中国自己的城与人、城市与文明，这些直接写中国现代城市的作家和作品，他们对于城市的批判也来自个体生命内部的心结。但与透过乡村的叙事和抒情来含蓄地影射、观照和批判中国城市的现代作家不同，这些现代作家的心结具体而言可以说是来自异域城市留学、游历等经验所带来的文明冲击和文化落差，他们对于城市的观照没有太多的影射和含蓄，更多的是毫不掩饰的直击，他们对于这城市中的保守与堕落所表现出的愤怒和失望，也常常是直接在文章感怀或者小说叙事当中表达出来。因此，与以乡土作为中国现代城市参照对象的作家相比，以外国城市体验作为本土城市经验的参照对象，他们心中的城市情结，更多地站在全球、历史、文明、民族这样宏大的角度，这给作家带来的心理冲击更大。中西文明对比之下巨大的反差在作家心中所结的情愫往往更不能释怀，同样是作为城市，但是他们所身处古旧中国的城，与他们所期望的现代文明尚相隔太远。老舍写《猫城记》，哪怕是名为“猫城”，亦有着较为坦露和直白的抒发：

一眼看到猫城，不知道为什么我心中形成了一句话：这个文明快要灭绝！……文明与民族是可以灭绝的，我们地球上人类史中的记载也不都是玫瑰色的。读历史设若能使我们落泪，那么，眼前摆着一片要断气的文明，是何等伤心的事！^⑧

老舍曾经在小说中多次用极为细腻的笔触和情感描写北京的名胜景物、风土人情，并在《想北平》等文章中非常诗意地赞美自己成长的北京，有着伦敦、巴黎、罗马这些西方城市所没有的安静与温和，称自己的性格和脾气都是这座城市所赋予的，但是无论是明写北京的陋俗与国民性，还是猫城样的指涉，老舍对于城市进行现实批判的经验又毫无疑问来自于北京。这又毫无疑问代表着一部分现代作家的城市心结的特点：他们不是作为城市的外乡人，特别是在域外城市体验的冲击下，他们对于中国城市的描写和批判更多是站在本土本乡的角度上，对于自己国家城市的爱之深，责之切。正如老舍在《猫城记》小说叙事当中突然插入的这段近乎直白的抒情和议论，甚至会有损于小说自身的艺术结构和价值，但这大概不应该看作是老舍的疏忽，更多的是这种城市心结和情感淤积于胸，不吐不快，不得不发。

和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其他城市不同，上海作为近代以来较早开埠的中国临海城市，通过迅猛的经济社会发展，成为世界范围内较为重要的现代城市。也因为上海这座更接近于西方、完全迥异于中国其他传统城市的国际化现代都市，有更多的中国现代作家能够近距离地体验西方城市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发达与繁华，郁达夫在文章中回忆起自己初次到上海的体验：

远处的灯火楼台，街下的马龙车水，上海原说是不夜之城，销金之窟，然而国家呢？社会呢？像这样的昏天暗地般过生活，难道是人间的目的么？……我想社会的归宿，做人的正道，总还不在这里。^⑨

现代城市不仅寄托着作家对于文学的种种情结，更寄托着作家对于近代以来饱经灾乱命运的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期望，西方现代的城市被一些有异域体验的留洋者当作了理想的处所，城市空间所蕴含的文化、思想、理念也一度成为一批中国作家、知识分子的精神向往和追求。但是西方文明强行与中国本土嫁接出来的殖民地城市和城市文化，带给中国作家的更多的是不安与惶惑，这座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进程、展现西方殖民文化的东方魔都，同样没有解开中国现代作家心结，相反更加增加了一批作家、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民族、国民性走向的疑惑。而这一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城市文明心结疑虑的加深，以及与此同时，以瞿秋

白《赤都心史》为代表，一种迥异于欧美现代都市的域外城市体验的逐渐引入，也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当中城市文学的走向。在京派和海派之间，促使了左翼文学的发生和不断发展。而相较于前两种文学流派，左翼文学的发展流变，毫无疑问与作家的城市心结有着更加深刻密切的关系。

三

城市文学是随着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变迁慢慢发展起来的，早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为代表、包括通俗文学作家包天笑、朱瘦菊等作家在内的小说创作，就对于中国现代早期城市的发展变化有关注和书写。这一批城市文学刚从古代白话小说描写旧时市井城市的文学样式当中衍变出来，他们和城市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方面这些作家已经实实在在地在描写处于现代化转型之中的中国城市，另一方面他们自身也是现代城市之下出版文化、稿费制度的产物。但是在这里，这些早期作家的城市写作尚且还只是停留于对于城市景观和人物的层面，他们内心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对于中国“城市”进行表达的诉求，或者说这批作家并没有对于城市概念和城市本身有充分的自觉，中国现代作家的城市心结在他们那里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

甚至在与城市最为接近的新感觉派作家的创作那里，我们看到作家无比投入、无比沉浸在现代上海城市的灯红酒绿、声光化电之中，他们描写的景观无不是城市的最直接的感官感触，他们描写的人物也无不是城市当中最放浪形骸的城市人。但是这其中又涉及城市在现代文学当中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便是城市与作家本人的关系层面，从晚清小说当中的城市文学因子到三十年代新感觉派笔下彻头彻尾的摩登世界，作家本人和城市是近距离的，甚至是融为一体的，因此他们所描写城市的细枝末节最能体现这些城市的具体风貌，这也是有关城市文学研究最为注重的一方面。第二个层面则是城市与作家内心精神的关系层面，在这一层面，进行城市书写、表达的作家，可以是在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距离体验过最发达城市风貌的留洋者，也可以只是从中国最底层的乡土世界刚刚进到中国城市当中的外乡人，他们对于自己笔下外国或者本土城市的了解，远远不及他们对于传统中国乡土世界的掌握。这些作家城市体验的表达，有很多只是自己内心对于城市现代体验感触的抒发。不同于城市与人的近距离，心与城市的距离是比较远的，而这种远，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却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远”也可以是相对于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作家和土地的亲近来讲的，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所生产出的诸多社会秩序、理念，以及进而由此而形成的文学表达方式，都会让作家在这一运转成熟的社会之下找到自己可以依循的生存法

则甚至是写作规律。但是在近现代中国中西方文明碰撞、社会发生剧烈变迁的时刻，这些旧的法则全部失效，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曾指出的：

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⑩

而西方以城市为载体的现代文明，从各种途径走入中国现代作家的视野和生活，这种转变过程当中发生转变的固然有中国的城市，也有作家内心深处的精神世界和价值理念。从城市当中市井阶层日常生活的变迁，到新的社会形态之下人性的变化；从城市景观的转换，到经济社会的飞速步伐，所有的一切对于中国现代作家而言都是崭新的。既有像上海这样繁华与糜烂同体的魔都，造就了新感觉派寻求刺激的文学描写和左翼作家群体对于都市罪恶的文化批判；也有北京这样乡土气息和城市发展共在的代表，使得老舍、林语堂等一大批作家对于这座城市老旧文化和国民劣根有着深刻揭露，又从这座古都当中吸取传统文化的精粹，希望给这座城市注入新的生命力。快速、多变而复杂，是相对于静止、停滞的乡村世界而言中国现代城市的状态，这种状态也进一步造就了现代作家对于城市复杂而矛盾的心结状态。

作家这种多元、复杂的城市心结状态，可能是正面的城市描写、表达与想象，例如对于中国城市和社会发展的呈现和肯定；也可能走向城市的反面，例如对城市的罪恶和堕落进行批判，进而返回到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图景之中。那些正面的城市书写表达，往往是异域城市体验和本土城市经验结合在一起，突然对于中国城市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影响、作用有强烈的感触；而对于城市的批判以及对于乡土社会的书写，则又蕴含着现代作家对于中国城市过去、现在、未来的思考和想象。中国现代文学当中的诸多文学思潮、发展轨迹，以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东方与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的观念和看法，都在一定程度上蕴含在现代作家群体这种城市心结当中。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与现代城市在中国的产生相伴，而现代作家这种多维矛盾的城市心结，又进一步促使着中国现代文学的继续发展和流变。

随着时代的变迁，20世纪中国城市的文学有过兴盛，也有过衰微，但是这种城市心结作为中国作家的精神脉络并未消逝。在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史中，现代作家笔下所有过的域外都市体验、外乡人进城主题、城市底层描写，又逐步重新出现在当代作家创作的视野之中。甚至在中国现代文学阶段附着在城市文学之

上的一些论争，同样可以在当代作家对于城市不同的思考、态度以及情感表达中找到。20世纪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是比较缓慢的，更多的城市心结产生于从乡村来到城市的作家体验，而当下特别是新世纪的城市文学和心结，则有了一种全新的角度、方式和视野，更多的作家是作为城里人来体验城市、创作作品，这也产生了不同的城市文学和心结。文学作品是时代的记录，也常常是作家内心的表达，正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对于城市不同的心态，这才是文学的发展。中国城市发展到了一种新的状态，没有好坏之分，只有情景不同。文学无论如何，应是对时代最经典的描写和最深入的思考，在当下，有关城市问题的写作和讨论在当代再次成为作家关注的重点和话题，并呈现出新的状态和诉求，这固然是中国社会近现代以来城市化进程不断发展的一种体现，但又何尝不是作家城市心结以及隐藏在心结之后价值观念、精神诉求的一种延续？

注释：

- ① 茅盾：《乡村杂景》，《茅盾全集·散文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9页。
- ②③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9、11页。
- ④ 苏奎：《中国城市的进化与现代文学的发生》，《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1期。
- ⑤⑥ 闻一多：《致吴景超、翟毅夫、顾毓琇、梁实秋》，《闻一多全集·12》，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52页。
- ⑦⑧ 舒济、舒乙编《老舍小说全集·二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57页。
- ⑨ 郁达夫：《海上》，《郁达夫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页。
- ⑩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7页。

[刘勇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基地
邮编 100875]